

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对浙江的启示

陈宇轩

借鉴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做法，浙江需在推动产业链本土化、拓展打造强大国内市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整体营商环境

外贸出口是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奠定了今日浙江在全国的重要地位。然而，受中美贸易战叠加疫情因素持续影响，浙江外贸出口出现较大波动，对完成全年经济目标产生较大压力，更对浙江产业经济行稳致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分析二战后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做法，为浙江在国际贸易环境趋紧背景下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日美贸易摩擦背景及应对

二战之后，国际贸易自由体系的形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打开了广阔蓝海。日本通过大力发展出口贸易，有力推动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期间，日本对美出口呈指数增长，美国成为日本头号贸易顺差来源国。而美国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触发了日美贸易摩擦。美国为维持经济霸权地位，对日本进行全面遏制。

日美贸易摩擦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其不同阶段的贸易摩擦焦点反映了日本产业升级的路径，主要分成 4 个阶段：即以合成纤维、钢铁等原材料产业为代表的贸易冲突阶段，以彩电、汽车等加工组装产业为代表的贸易冲突阶段，以高新技术产业、电信服务业等为代表的贸易冲突阶段和以汇率为代表的金融战。纵观日美贸易摩擦的每一阶段，由于日美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美国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影响力施压，使得摩擦涉及领域不断扩大、程度愈加激烈，倒逼日本产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变，实现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日本应对主要有以下三个做法：

提早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日本政府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将纺织、钢铁等国内已经或即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海外转移，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为国内新兴产业升级换代腾出空间。在推动日本国内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日本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在国内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保留部分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线，以及核心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品的生产环节，以保持一定的先进制造工业水平。

改革内部经济制度，拓展多元化开放市场。“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政府开始经济结构改革，逐步放松国内经济规制，对外开放市场。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侧重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打破行业垄断壁垒，促进市场竞争，带动整个经济朝着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国际市场方面，随着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单一地向美国市场出口转变为以 WTO 为主的多边贸易合作方式，积极投入多边贸易建设，如构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使贸易对象更加多元化。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加快跨国并购重组步伐。为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部影响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1986 年《前川报告》提出必须要积极加入全球竞争和合作，加大制成品进口与海外直接投资力度。日本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引进科研成果和先进科技，提升本国创新能力，特别是针对欧美地区，仅 1986 年日本就收购了超过 120 家的美资企业。

贸易摩擦下日本与浙江产业发展比较

浙江与当时的日本都具有较高的对美贸易依存度。日美关系复杂，二战之后日本变为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日本对美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 1980 年的 24.2% 上升到 1984 年的 35.2%。浙江对美出口依存度也相对较高，对美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 19%，占全国对美出口 12.7%。在浙美资企业超过 6000 家，在美浙江企业超过 1300 家。但是浙江在产业发展中更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在研究和解决每个阶段浙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问题上，更注重本土产业结构发展演变规律。

浙江与当时的日本政府都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日美贸易摩擦下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依然呈增长趋势，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值从 1988 年的 648.98 亿美元迅速增长到 1994 年约 1118.39 亿美元，同时占制造业出口比值也不断上升，这是日本整体产业发展未受到实质影响的重要因素。浙江也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集中力量扶持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产品，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的产业和企业，出台了投资负面清单。

浙江与当时的日本微观主体都主动加快技术进步。日本形成“雁阵模式”，旨在将进口与出口有机结合，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日本通过将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为国内的支柱产业与高端产业升级和更新换代腾出了资源和宝贵的空间。比如，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芯片的市场份额居全球首位，且世界半导体销量前三位均为日本企业。浙江在积极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提出了“四换三名”战略，就是加快“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的步伐，名企、名品、名家不断涌现。

浙江比当时的日本拥有更广阔的国内市场支撑。日本国内产业萎缩，新兴产业发展乏力，不足以弥补制造业产业转移带来的增长动能缺失。相较日本，浙江产业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支撑，并且有着日益完善的市场体系和不断优化的市场环境，对国内外的各种优质资源无疑具有很强的“虹吸效应”。目前，浙江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阶段，拥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为浙江未来产业升级筑牢坚实基础。

对浙江产业升级路径的启示

进一步加强自主研发，推动产业链本土化。加快构建“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级联动生态系统，实现有机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谋划建设“产综研”机构，加强产学研各类创新资源的统筹协调，承担基础研究单位不愿做、企业不敢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打造成为共性关键技术的策源地和高水平研发机构的共同体。加强政府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创新重点技术攻关体制。全力推进之江实验室建设，打造科技创新旗舰、数字浙江平台，培育发展新动能。

进一步挖潜内需市场，拓展打造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数字化赋能，通过打造数字经济“一号工程”，赋能传统产业，打通供需两端。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应用为导向，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新零售+新制造”模式，通过采用全产业链，以电商平台优势直接链接消费需求“，线上+线下”共同发力，解决供需两端不匹配问题。共建工业互联网直播平台，以期实现更多生态资源的共建共享，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进一步培育新型市场主体，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绣花功夫”精准服务制造业企业，解决市场准入、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破除行业隐形壁垒和歧视。稳定传统产业投资需求，鼓励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中长期融资，加强土地、信贷等资源要素保障。大力引进人工智能、

新材料、生命健康等中高端项目，加大力度落实科技新政、人才新政、投资新政，加强传统产业技改支持，平稳新旧动能转换接续。鼓励一代“草根”企业家向二、三代精英企业家转变，实现企业现代化管理方式，提升企业制度执行效率，提高企业治理水平。

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优化整体营商环境。在供给最优制度上胜人一筹，在营造最佳发展环境上快人一拍，在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上先人一步。研究制定海外投资省级立法，加快出台浙江营商环境评价机制，争取将杭州列入世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样城市。另外，投资促进法人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浙江这方面的中介组织较少，发展潜力较大。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命健康产业，把握疫情下的产业发展机遇。浙江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基础较好、潜力巨大，新冠疫情期间医药品出口显著增长。2020年一季度，医药品出口22.8亿元，增长24.4%。通过发展医药核心产业，为生命健康产业提供大量的原料，进而推动生命健康企业聚集，进一步促进核心产业链中原料、研发和销售环节附加值的提升。鼓励医药企业全球化运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省外建立生产基地，延伸产业链，形成“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发展模式。